

新人文论

小说与诗的艺术

XIAOSHUO YU SHI DE YISHU

周政保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育海
封面设计 靳 斌

小说与诗的艺术

周政保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插页2 字数232,000 印数0,001—4,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316 定 价: 2.00 元

87
I206.7
305
5

BF 77/20

小说与诗的艺术

浙江文艺出版社



B

1206.7

序

王 蒙

这几年，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年轻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思想活跃，知识丰富，感应灵敏，对于当代的生活、思潮、文学艺术现象似乎有更贴近的感受和理解，他们的评论文字给我们的文艺论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其中，立足于大西北边陲的周政保已经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生活在新疆，又是军人，当然对于反映大西北生活的作品，对于军事题材的作品有更多的注意。他对于张承志、刘兆林、唐栋、艾克拜尔·米吉提、章德益、周涛等人的作品，都作出了很好的分析。但他又绝无那种边远地区的局限性，没有那种小家子气，他对于创作、理论各方面的新课题不但有浓厚的兴趣、执着的追求，也有开阔的思路、恢宏的思考、颇具新意的论述。例如他的关于小说观念、小说结构、小说内涵的层次的观点，他的关于象征和诗的观点，他的关于评论的高度与角度、关于评论方法的多样化的观点，都提得很好，我赞成，我欣赏，我期待着他做出更深入、更

寻根究底的研究。

但他又与某些颇有新意、刻意求新但又不无偏狭、不无新的片面性的论者不同，他对于时代精神，对于改革题材，对于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认识价值与社会意义不是抱某种时髦的不屑一顾的态度，而是予以实事求是地、认真地评价与研究，并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一种对文学的性质与功能的比较宽阔、比较健康的理解，应该说是值得珍视的。

我祝贺他的第一部评论集子的出版。我感谢他对于我的某些作品的关注。我认为他理应对创作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与认真的批评，我盼望他能取得更大得多的成绩。

目 录

序

王 蒙

追寻容量：当代小说观念的新变	1
小说创作的新趋势：民族文化意识的强化	17
象征：小说艺术的诗化倾向	23
走向开放的中篇小说的结构形态	34
对改革题材小说的美学思考	48
醒悟了的大西北文学	57

目 录

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长进与开拓 63

——评近年来军事题材短、中篇小说的创作

这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88

——评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短、中篇小说

为严峻的生活奏起深沉有力的乐章 98

——评张承志的小说创作

象征、寓意的层叠：张承志小说中的“诗” 111

目 录

《北方的河》：写实与象征的崇高流体	120
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艺术	131
论刘兆林小说的艺术魅力	147
他以自己的方式写着严肃的人生	158
——读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	
《在伊犁》：王蒙的幽默感与思情	166
星，从冰山升起	177
《空地》：意味着什么	181

目 录

生命的河曾在黑暗中流淌	189
——评《山中，那十九座坟莹》	
粗犷的男性的北方	195
——评《荒漠与人》	
《铁床》：负载着严峻的人生	204
中国当代军旅诗的新生界	212
新边塞诗的审美特色与当代性	233

目 录

超越具象	247
——论周涛的诗歌艺术	
章德益的幻想世界：人与自然	262
《复活的海》：“我从土地来”	274
评杨树的《无愧的歌》	283
柯尔克孜族情歌的情调及“兴”的特色	291
马的情景描写	303
——蒙古族情歌中的现成思路	

目 录

方法与前提	313
——谈评论的高度与角度	
文学评论的方法也要多样化	323
后 记	329

追寻容量：当代小说观念的新变

说到小说观念，不能不使人想到整个文学的观念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通常可以用六个字来表达：反映，工具，服务。这样概括也许比较刻薄，但几十年来流行的创作动机及一般文学效果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作为文学观念的理论体现——诸如“文学概论”与“文学的基本原理”一类的教科书上，也是这样倾心尽力地阐释与论述的——尽管其中不乏“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旁征博引，但在整体性的创作实践中，并没有真正获得美学范畴意义上的贯彻。由于文学的宏观认识、特别是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方面的简单化理解与极端实用主义倾向，直接导致了小说创作的单一、肤浅与僵化。即使是一部可读性颇为出色的，因而仍受到一般读者欢迎的作品，也大都是仅仅以讲一个生动精彩的故事而自慰自足，至于作品所叙述的故事及其所可能包孕的思情容量——那种真正体现了审美价值的深度、广度与厚度，那种经得起历史跨度的严峻考验的艺术生命力，那种可以在更加宽泛、更加宏阔的时空范围内引起读者共鸣与思考的情感扩张强度，则极少被放到一个具有相应

俯视点的位置上去审察，或者出于社会时势的局限而无法获得考虑的机缘与权利。可以说，由于整个文学观念的僵滞与退化，我们的小说曾走进了一个目光短浅、思路狭窄、丧失了拓进指望的“死胡同”。

而近几年来，作为评论家与小说家（特别是中青年小说家与评论家）共同耕耘的报偿，小说的观念终于出现了异常明显的变化。艰辛而富有成效的探索，不仅使我们的小说创作走上了真正的文学轨道，而且在继承民族小说传统与借鉴国外现代小说艺术（包括现代主义流派的小说艺术）的基础上，经由自由的选择与创造，迅速而又渐进地更新了当代小说的观念——小说家与评论家都开始意识到作品的追寻目标及思情的容量问题了。这是一种标志着醒悟与自觉的变化。当然，任何观念的变化，都是现实生活的变化，特别是整个经济生活的变化引起的——文学观念也不能例外；不过，小说观念的变化，还离不开整个小说创作领域的种种试验性的实践，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但这种发展中的观念变化，一旦又还原于小说创作的实践，并集聚与汇合为一种内在创造力的时候，那就可以起到使整个小说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推动作用，甚至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刻地影响到整整一代作家或几代作家的文学创造素质。这就是观念对于创作的制约性与能动驱力。因此，我们在宏观地审视整个小说领域的巨大变化时，无论如何应该深入到这种变化的内部、特别是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及其思维方式中去。

如果说，我们以往的小说创作主要是一种通俗的、单层次或直线式的寓意方式，那现阶段被文学界所承认的、而且

体现着主流地位与发展方向的小说创作，则呈现为一种多层次性或辐射式的、更趋于严肃深刻、更富有创造性与包容量的寓意方式。这种寓意方式，虽然不排斥故事情节的编织与人物性格的刻画，但它们并不仅仅以此作为自己的最终创造目标；它们的目标，要比一般的故事构筑、一般的情节安排、一般的性格描写、一般的细节选择，具有更为宏阔高远的审美特质。无论是王蒙、陆文夫、邓友梅、徐怀中、林斤澜的小说，还是张承志、邓刚、贾平凹、郑义、陈世旭、阿城、韩少功、李杭育、路遥的小说，或者是张抗抗、张辛欣、张洁、乔雪竹、王安忆的小说，都凸现出这种新的小说观念的特点。他们的作品，既不回避现实世界的严峻性，也不躲开社会生活的矛盾性，而是力图透过自己的描写内容，并在寻找最佳容括量的过程中，实现主观意识对于整个人类生活及其社会存在的深切感受与总体发现。于是，小说创作不仅仅体现为反映生活，更重要的是表现生活：即经由多种形态的艺术把握方式，深刻地表现整个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表现那种严肃的现实探索，那种深沉的情感倾诉，那种执着的人生追求，那种真诚的道德评价，那种无穷无尽的人性开掘，那种对于历史的追寻与剖析，那种对于人类命运的忧虑与自信……十分明显，这种着力于表现生活的小说观念之所以为众多的优秀作家所接受与贯彻，原因就在于它有利于小说思情容量的扩大。就当代小说的发展行程而言，现阶段的小说观念所呈现、所标志的变化，的确是令人瞩目的，但在这种以追寻容量为主要目的的观念转机中，究竟有些怎样的审美意识及艺术创作因素获得了觉醒与生长呢？仔细考察，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作意识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I 思情包孕的多义性意识

这里所说的“多义性”，主要是指作家自我意识（主观命意或主观倾情）的多元性与多层性倾向，即试图在一部作品中注入更复杂、更丰富、更值得读者回味的思情，而不是指中、长篇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种多主题的构思方式。在以往那些岁月里，我们都把主题的集中、突出、鲜明，乃至与政治中心任务的密切配合，视作一部小说的成败优劣的重要标志，而且，一部作品只能具备一个主题。那种“直奔主题”的思路，几乎替代了作家对于生活的复杂感受与多样性的理解；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也往往采取一种非立体化的简单方式，或勇敢，或懦弱，或高尚，或卑鄙，或纯真，或污浊，或粗鲁，或精细，或十全十美，或一无是处……性格寓意的单一性所导致的浅薄感，很难使人感觉到生活的本来面目，更无法把实在世界的真实形象完整地推到读者的面前。而思情包孕的多义性意识，则从生活的真实印象出发，直接否定了“直奔主题”的线型思路，并把小说审美的趣味提高到一个与现实生活相适应的水平。作家们领悟到，一部小说不一定只能孤立地确立一种题旨，而是可以、也完全可能经由有限的描写，获得一种充满了相对无限性的、很难用几句话概括与表述的思情寓意，一种富有多义性的、但又不乏方向感的容量特质，一种可以给读者留下深深的回味与广阔的思考余地的审美扩张性。如王蒙的中篇小说《虚掩的土屋小院》，就具有某种题旨命意的辐射气息：所描写的仅仅是一座“土屋小院”，且是“虚掩”的；然而正是这“虚掩”的缘故，所以再古老淳朴的生活也终究抵挡不住时代思潮的趁“虚”而入。但在这种谁也无法躲避的社会力量的冲

击下，那座边远的清真寺旁的“土屋小院”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而读者又接受到了怎样的“主题”？这恐是难以运用精确简洁的语言表述清楚的。作品所贯穿的情节、所描写的场面、所刻画的人物、所渗融的思情，确实呈现出某种多元性与多层性的色泽——对极左路线的幽默抨击？对普通人生的严肃揭示？对美好品格的热情歌颂？对底层劳动者的关切与同情？对机智而善良的社会人性内容的真诚赞美？对神圣的宗教方式的肯定与否定（作品描写了两种既共通又不同的宗教方式：严格按时地做“乃玛孜”与虔诚地背着小红书包到处宣传连宣传者本身也没有搞明白的“思想”……）？或者是对维吾尔风俗民情的形象性展现？……似乎都有，但又没有这般简单。于是我们只能说：作品富有开放感地抒写了一种严肃的人生（那是抽象的描写主旨），而这种人生的内涵又是呈多义状态的（那是具体的描写寓意）。只要读者乐意配合，那就可以从作品中获悉各种各样的富有启迪性的生活信息与共鸣内容。又如陈世旭的《天鹅湖畔》。对于这部表现改革生活的中篇小说，我们可以提出诸如描写粗糙之类的批评性意见，但作品所揭示的题旨意义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却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与估价，特别是小说寓意的多义性，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广阔的思考余地。作品的命意及题旨，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独到发现，而且呈现出一种历史的系统性意蕴，而这种系统性意蕴所包孕的，正是作品思情的多元性与多层性特质。也许人们可以说，这部小说的主旋律是表现改革事业的艰难感与信念感，然而作为具体的思情笼罩，更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历史发展的足迹，人生历程的标志，人的真正价值的肯定，以及那种情感与道

德的探索，那种理想与前景的追寻……而这一切，又都富有方向感地获得了系统性的组合。于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改革主题的图解，而是一幅充满了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具有某种整体意味的当代生活长卷画。其实，只要我们透过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章友法、刘宗昌，还是那个忠心耿耿、正正派派的季嘉兴的苦心选择、审慎安排与不乏目的性的刻意描写，透过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发展史，以及这种性格发展史中容括的对于现实总体的观照与发现，就不难感觉到作者在小说的结构与立意上所贯彻的思情包孕的多义性意识——一种交织着肯定与否定、对立与统一意识，一种体现了生活矛盾的同一性的意识。可以说，作者在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内心深处，几乎都具有侧重点地寄托着所要传达的一种或多种思情寓意——而这种人物性格刻画的多义性特点，正是多义性思情包孕的基础；离开了人物的性格刻画，也就丧失了作品思情包孕的最大可能性。

Ⅰ 思情包孕的超量性意识

所谓“超量性”，是指艺术描写所实现的思情容量（数量和质量）不寻常地超出了反映对象的本体范围，或者说，大大超出了一般的审美眼光所可能截获的信息量与容括量。就象一对自由飞翔的白色水鸟——作为作品构思的契机，那是很难设想可以延伸为一篇出色的小说的，但何立伟的《白色鸟》却成功了。成功就成功在：作者不仅自觉地意识到了、而且机智地捕捉到了描写对象的寄托性，以及这种寄托性所可能包笼的、作为社会情绪与生活心境出现的寓意容量。在一般人的思情天平上，作品所体现的寓意容量与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现象是不容易平衡的，然而在何立伟那里却被